

非通用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内涵嬗变研究^①

陈校语



摘要:非通用语专业在我国的建设一度缓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原本少量集中分布于个别高校的非通用语专业在专业数量、分布区域和人才培养水平上都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在国家战略需要、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人才培养目标从单一专业性人才逐步向复合型、国际化人才转变。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变化之际,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嬗变,向新的高素质、高水平、高层次人才目标迈进,使之能够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内涵嬗变;后疫情时代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Evolution of Non-common Language Major Talents Training Objectives CHEN Xiaoyu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on-general language majors in China was once slow, but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on-general language majors, which were originally concentrated in a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 universities, have developed by leaps and bound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majors, distribution area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level.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post-epidemic era and the far-reaching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the connotation of non-general language talents cultivation goal has also changed to a new goal of high quality, high level and high sphere talents, which can be used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building of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 community

^① 本文为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第一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非通用语专业立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朝鲜语专业为例”,以及大韩民国教育部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事业团)“浙江地区海外韩国学种子型课题支持项目(AKS-2020-INC-2230008)”的研究成果。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Non-common language talents; training objectives; connotation transmutation; post-epidemic era

1. 引言

非通用语广义上指除英语以外的语言,狭义上的非通用语范畴通常有两种界定,一是指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英语、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以外的其他语种,二是指教育部《关于申报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通知》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设定的除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以外的其他语种。本文主要采用第二种范畴,在教育部设定的非通用语范围内探讨我国非通用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内涵的嬗变。

我国非通用语教育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非通用语人才数量少、分布集中于顶尖高校,对专业性要求较高。随着我国与非通用语国家的交往日益密切,传统的专业型人才逐渐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社会需要,人才培养目标逐渐向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等人才目标靠拢。总体来看,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变化经历了传统的“专业应用型”人才、“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复合型”人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化”人才等3个阶段。

2020年1月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场剧烈震荡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甚至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的推进也会产生深刻的作用,进而影响到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要素和具体内涵。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梳理既往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的嬗变过程,探讨其包含的目标指向和具体内涵,同时结合后疫情时代的特征和相关预测,尝试对后疫情时代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展开前瞻性分析。

2. 传统“专业应用型”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内涵

国内非通用语专业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设立,但相对通用语种来说,发展较为缓慢,到21世纪初国内仅开设30个非通用语种专业,且其中17个语种专业只开设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其余13个语种专业也集中在数所高校内。(贾德忠,2002)20世纪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对外文化交流干部。因为培养机构和招生人数少,人才主要流入国家亟须的外交部门和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口笔译或学术研究工作,因此对人才的诉求集中在专业技能方面,强调人才必须具备相应语种的语言基本知识和听、说、读、写、译能力,也通过开设对象国概况、史地、文学、语言概论、世界史等课程培养学生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许清章,1984)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一直保持着工业社会背景下教育体系培养标准化专业人才的诉求,尽管时代在发展和变化,但“专业性”始终是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性、基础性要素。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在2018年编制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为《新国标》)中对外语类专业培养目标做出了原则性阐述:“外语类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掌握相关专业知识,适应我国对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类涉外行业、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的各外语语种专业人员和复合型外语人才。”《新国标》的整体性培养目标阐述中,将语种专业人员和复合型人才作为并重的目标。在这个宏观的目标框架下,对外语人才的要求始终体现在强调对外语知识基础和外语应用能力的培养,而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也包含在整体外语人才培养目标框架内,其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之一是“专业性”。

《新国标》在课程体系上也体现了对语言基础知识和能力培养的重视。非通用语专业核心课程包括高级专业外语、基础专业外语、专业外语写作、专业外语视听说、专业外语口语、专业外语语法、专业外语文学史、专业外语汉语互译、对象国或地区文化等。培养方向课程可包括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外语教育、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专门用途外语、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类别。外语技能课程注重对听、说、读、写、译能力的训练,专业知识课程则注重对对象国语言学、文学、国别与区域、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能力的培养。

总体来看,“专业应用型非通用语人才”是“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非通用语种知识基础、良好的应用能力,能将非通用语语种知识应用于具体实践工作中,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综合素质人才”(全永根等,2015)。具备专业性的应用型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内涵包括过硬的外语语言基础知识、对象国地域文化知识、扎实的外语应用能力。这一目标的形成反映了传统的工业社会以标准化专业为核心的教育理念。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其内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3.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复合型”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内涵

关于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的研讨初步形成于21世纪初。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国家开始需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全方位参与竞争的外语人才,非通用语专业面临着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发展机遇,同时承受了专业规模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学生的综合素质不足以适应跨文化交流需求的压力,传统的单一型非通用语人才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大量复合型人才需求,而具备较好的英语水平及非外语专业知识的非通用语专业毕业生更具就业优势。2008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大任务,应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于是,21世纪初,人才培养目标由20世纪的非通用语专业技能型人才向复合型人才转变。尤其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涉及 65 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在贸易、基建、运输、能源、金融、旅游、电商、科技、法律、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多边贸易合作,因此,把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与非通用语相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任务,这就要求复合型非通用语人才对非通用语之外的专业具备较完善的知识体系和较强的综合应用能力。

在复合型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探索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复合型”人才和“复语型”人才 2 个核心培养方向。从形式上来说,通常认为“复合型”是非通用语专业和另外一个非语言类专业的复合,具体如潘克建(2004)所提出,既具有扎实外语功底和汉语言知识,又熟知外交、经贸、法律、旅游等相关学科。其培养方式主要为辅修、第二学位、专业方向课等。“复语型”则是非通用语和另外 1—2 门外语的复合,参与复合的外语通常是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具备基础的英语(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泰语+英语”专业),或者与该非通用语的语系或语法结构相近或分布范围相近的其他语种(如大连外国语大学的“韩语+日语”专业),其培养方式包括专门设置的双语专业、双语方向、辅修课等。

经尝试和发展,“复合型”方向已产生了诸多不同类型的模式,在信息化社会能够得到更大的优化空间,而“复语型”方向除个别院校仍在继续推进外,很多高校已经取消了这种形式。原因在于,复合型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目标建立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发展需要的基础上,需要有针对性地与非通用语对象国开展交流合作,其核心内涵除了要求掌握非通用语知识和应用能力外,还要求必须具备可以落实到实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相对于“复语型”人才,“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更能胜任要求。因此,教育部 2015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要求各高校加快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应用型、复合型非通用语种人才,为更好地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和“走出去”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4. 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化”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内涵

上述《意见》对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要求中,除明确提出“应用型”“复合型”以外,也增加了“国际”这一重要标签。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的联系更加密切,国际交流合作得以全面铺开,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自 21 世纪初开始受到关注。随着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参与度日益增强,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伴随着人民币“入篮”,国际化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也跟着水涨船高。

在讨论如何培养国际化非通用语人才之前,首先要明确被纳入教育发展战略蓝图关于国际化的关键词汇在外语人才培养目标语境里的深刻内涵。

《纲要》在提出培养国际化人才这一目标时,列举了“国际视野”“国际规则”“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等与“国际化”相关的关键词。“国际化”的关键特征在于认知内涵,要在专业范围内视野宽阔,能够跨越地域、文化乃至时代局限,具有较强的求真、求新、创

新意识,在坚持民族、时代特色的同时符合当代乃至未来人类发展的普遍价值标准和发展进步主旋律(赵立宪,2013),尤其应该改变自我中心主义,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具有向全球开放、为全球服务的意识(徐真华,2009)。同时,也要通晓国际惯例,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在经受多元文化的冲击时,能以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正确、妥当地应对和处理情况(庄智象等,2011)。体现在非通用语专业领域,则应该了解对象国的文化,能够直接参与到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全永根等,2015)。

这些内涵体现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要求非通用语人才除了要具备人才所必需的知识储备(包括对象国语言文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非通用语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等)以外,也要能够在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时,先以世界公民的开放视角和兼容并包的胸怀理解对象国的国情、文化,深入地了解在与对象国的国际合作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注意事项,后以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素养与对象国得体沟通,展现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

5. 后疫情时代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

综上所述,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随着时代发展和形势需要的变化,其内涵要素是不断叠加的。由20世纪以“专业应用型”为核心,逐步转变为21世纪初“应用型”“复合型”并重,又进一步增加了“国际化”这一内涵要素。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席卷全球,拉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随着各国在经济困境下将产业布局收缩回国内,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看,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过程中会呈现出周期性,但疫情对其走势和速度产生的影响也是长期的,将带来更加充满竞争性和不确定性的新全球化。在这样的后疫情时代,首先需要做出调整和准备的便是身处国际交往第一线的外语人才,在这一关键时期,必须依托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共建,提炼适应新时期需要的人才培养目标内涵,打造新的非通用语人才竞争力。

目前虽然各高校没有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做出重大调整,但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和《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2021),未来的非通用语人才应该是具备能够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的高水平、高素质、高层次人才。

5.1 具备“一带一路”建设复合知识体系的高水平非通用语人才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过去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全球化逐步走向全球各国多边合作的多极全球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加医疗、教育、能源、高科技等方面的相关产品进口,更加强调开放与产业的融合协同。加强互联互通,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推进经济全球化具有重大意义,后疫情时代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将进

一步得到深化,在我国“十四五”期间进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和规划的规划下,未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公共卫生、旅游、教育、智库、科技等领域都将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而这也对非通用语人才所具备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上文所述的专业化方向发展的非通用语人才不同,复合型非通用语人才更加注重非通用语之外的专业素养,即具体应用到国际共建中的专业领域,尤其是推进高质量共建的科技、贸易、医疗、交通、法律等领域。

由于非通用语专业体量小,基础薄弱,目前在非通用语专业内实行的培养模式所产生的复合成效亟待改善。非通用语由于师资力量欠缺、人才需求具有地域局限性等特征,通常开设于外语类文科院校,因此可供复合的专业往往局限于国际贸易、市场营销、新闻学、旅游管理等非外语文科专业。但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中极具需求的运输、基建、科技等理工科领域则呈现空白,远远无法满足国家的需要。很多院校通过高年级开设专业方向课的形式进行专业复合,由于学程短导致专业课只学习到皮毛,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高层次需要。

高水平复合型非通用语人才需要非通用语和其他专业的真正融合和互渗,而不是简单地叠加与组合。据冶慧颖(2020)调查,目前我国在国际专业领域的高端专业性非通用语人才仍旧稀缺,虽然在形式上我们已经实现了多种组合模式,但在大学有限的培养时间内,要突破外语学习规律的限制,真正实现内涵上的专业深度融合,使学生毕业后可以在有需要的重要领域内深度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必须改变培养思路。

对于实践性要求较低的文科类专业,在“非通用语+其他专业”的模式基础上,互联网知识共享和在线教育可以较好地实现专业匹配,尤其是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后疫情时代,其复合路径将得以进一步拓宽。而对于实践性要求较高,而不是仅通过在线教育或数字化学习便可以掌握要领的专业,则可以将复合重心翻转,将模式转换为“其他专业+非通用语”模式,这也是上文所述专业性人才在内涵要求和培养模式上的差别。

5.2 具备数字化应用能力的高素质非通用语人才

在《新国标》(2018)的人才培养目标阐述中,叠加了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培养具备一定流动性和跨领域性人才的需要。换言之,在进行精准专门化的发展方向上,必须融入跨学科化发展方向,既培养其语言领域的专业能力和技巧等常规专长,也培养学生跨领域解决问题的适应性专长,使学生具备非通用语专业知识和应用能力,同时在知识体系中融汇跨学科知识,从而能够解决多领域的问题。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在传统教学中较难实现,但目前随着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具备跨学科高素质专业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变得可行起来。

全球的生产和生活已经高度依赖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尽管造成了诸多物理隔离,许多经济上对外依赖的国家开始调整产业布局以减少对全球化的依赖,但却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向经济数字化方向的转变: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应用。这种态势使全球面貌发

生急剧性转变,在疫情中加速成长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在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下塑造新的经济全球化增长点。这将会推动人类社会进一步向数字化和智能社会演变,非通用语人才必须适应这种新的更具数字化倾向的国际化需求。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大力推行在线教育,网络教学资源体系建设和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方兴未艾。随着数字技术日臻完善,后疫情时代的非通用语教学将更多地应用数字技术,从而推动学校教育从教学生读书为主,转变为教学生读“网”为主(王竹立,2020),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浅度的知识获取和信息传递变得更加容易和普及,在信息化社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在进入非通用语专业领域前即已经掌握了灵活运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初步能力,而今后更加日常化的信息技术应用可以充分地保障非通用语人才获取跨学科知识的便利。对于向非通用语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学生来说,可以轻易地实现非通用语专业知识与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尤其是理论性较强、实践性要求不高的学科。今后,通过信息化教育培养高素质专业性非通用语人才,将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实现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5.3 具备领导力和大国意识的高层次非通用语人才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应“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需求,国际化非通用语人才内涵进一步深化。辛越优(2016)根据“五通”需求将国际化人才划分为全球领导型国际化人才、高端技术型国际化人才、创新创业型国际化人才、金融领军型国际化人才、人文交流国际化人才等5类,对国际化程度做了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到,由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我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合作的程度逐渐加深,国际社会对我国青年作为大国领军群体的期待值也在提高。而我国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向国际社会展示的经济实力、制度优势、大国魄力和担当、天下大同思理和国际主义情怀无不引起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因此,对国际化非通用语人才的要求也势必随之提高,其在国际交往中不仅代表着非通用语专业人才,而且代表着世界大国的新生代力量,在领导力、区域国别知识、高层次理论体系、决策管理水平等方面也要具备更高层次的国际视野,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

从“十三五”规划中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我国将在“十四五”期间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展现更加具备责任感的大国担当。世界各国在与我国青年人才进行交流时,会关注在他们身上是否具备体现了大国风范的领导力素质,其中包含了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效处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适应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协调与竞争的能力等。这是在国际往来中展现中国形象,弘扬文化自信所必需的素质。

当要求非通用语专业人才具备跨越多个领域的对象国国情知识,熟知对象国国际规则,并能够运用非通用语与对象国沟通,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时,除了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也必须具备能够将通识性知识融会贯通,进行正确的综合性决策,并能够以良好的国际化素养与对象国达成圆满沟通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是在传统工业时代

教育体系下较受忽视的。

虽然近年来非通用语专业大量增加,但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高层次非通用语人才仍严重不足,此类人才基本都以研究生培养为主。但正如孙琪、刘宝存(2018)所指出的,由于研究生阶段开展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专业较少,拥有硕博学位的非通用语高端人才培养乏力,这会使得未来非通用语师资储备不足,从而影响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如前所述,不管是在高层次的外交谈判或商贸沟通中,还是在民间文化交流中,了解对象国的国情和文化十分重要,因此,从本科阶段就将区域国别知识与语言知识相结合来培养相应的非通用语人才是符合今后发展趋势的。以往的本科非通用语教学中虽然也涉及区域国别知识的教学,但往往仅限于浅层的介绍,或局限于文科知识领域,教材上的数据更新也较慢,而在今后的人才培养中则需要深度的区域国别知识教育,并将范围扩大到“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更广阔领域。不妨参考韩国诸多高校,以区域国别而不是语言专业来进行院系命名,如中国学系即通过汉语语言进行中国国情和文化学习的院系。在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时,将区域国别教育与语言教育相融合,则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核心将从具备一定区域国别知识的语言人才向以对象国语言习得区域国别知识的人才倾斜,在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时,也使其成为具备对象国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深度知识的通识型国际化人才。

目前,为实现国际化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国内高校普遍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交流合作模式,引进对象国师资、教育资源,派遣师生赴对象国交流或进修,通过国内外高校联合培养、学分接轨、学历互认等方式给学生提供各类国际化学习机会。同时,借助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教育数字技术在高校的普及,获取对象国语言和文化资料变得简单可行。因此,在教学环境、教学资源的国际化上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国内院校在教学管理上采用自上而下的层级化管理,教学方式上也习惯于以教师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知识传授讲解,要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和开放的国际视野,还需要在教学管理与教学方式上做出改革。

综上,后疫情时代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应立足国家“双循环”新格局,在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一带一路”共建的目标下,面对充满危机和挑战的新全球化局势,深化高素质、高水平、高层次非通用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利用数字技术,采用灵活多变的培养模式,培养更加具备多学科领域知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具备解决跨学科问题的复合型非通用语人才。

6. 结语

经过近80年的建设,我国非通用语种专业从零起步,无论是语种数量、分布院校还是人才规模上都取得了飞跃式发展。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非通用语人才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国内除了传统外语高校外,众多综合性大学和地方院校中也相继开设了非通用语专业,以满足地方发展需求和社会需要,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

重要性凸显,关于非通用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也积极开展起来,出现了许多探讨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现状、模式、课程体系、存在问题的研究论文,但鲜有关于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的分析和阐释。因此,本文结合以往关于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就专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嬗变的人才目标关键词及其内涵进行了分析。

随着时代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我国参与全球建设和改革的程度不断加深,对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从单纯的专业性人才转向复合型人才,同时,在人才素质上也要求其具备更加符合后疫情时代复杂局势的新全球化视野,具有能够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综合能力,因此“国际化”也成为非通用语人才培养重点目标之一。今后,在后疫情时代带来的新全球化形势下,非通用语人才需要面临更加严格的挑战和更加开放的学科跨度,具备更加适应信息化发展的技术能力,以及更能有效地进行深度跨文化交际的国际性领导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 贾德忠,2002.加入WTO后我国非通用语专业发展思路初探[J].中国高教研究(5):90-91.
-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潘克建,2004.关于全球化背景下我校外语非通用语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几点设想[J].东南亚纵横(12):87-91.
- 全永根,林明,周慧珊,2015.“非通用语种+英语”双外语应用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J].东北亚外语研究(4):65-69.
- 孙琪,刘宝存,2018.“一带一路”倡议下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现状与发展路径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8):41-46.
- 王竹立,2020.后疫情时代,教育应如何转型?[J].电化教育研究(4):13-20.
- 辛越优,倪好,2016.国际化人才联通“一带一路”:角色、需求与策略[J].高校教育管理,10(4):79-84.
- 许清章,1984.亚非地区非通用语言人才的培养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3):63-65.
- 徐真华,2009.培养全球化高素质公民的探索和实践[J].中国高等教育(11):20-24.
- 赵立宪,2013.什么是国际化人才的关键特征[J].国际人才交流(7):55.
- 庄智象,韩天霖,谢宇,等,2011.关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几点思考[J].外语界(6):20-24.

作者简介:

陈校语,女,1982年2月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韩国语教育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韩国语教育学、中韩影视文学比较。